

## 朱元璋的佛教思想及政策析论<sup>〔\*〕</sup>

○ 黄世福

(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,安徽 合肥 230022)

**〔摘要〕**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家当过和尚,后建立帝业。出于封建统治需要,太祖以儒立国,但对佛教仍较为尊崇。他亲自为《心经》作序,撰写大量关于佛教的文章,对佛教空有虚实、三教关系、天堂地狱说、修行观等,作了新的阐释,体现出其独特的佛教观。在此思想的影响下,朱元璋一方面对佛教采取怀柔、礼遇政策,另一方面是整顿和限制政策。朱元璋的一系列佛教政策,不仅对明代经济发展、中央集权政治强化、有明一代佛教政策的制定等产生影响,同时也加剧了佛教的衰微。

**〔关键词〕**朱元璋;佛教思想;佛教政策

朱元璋对待佛教的态度和观点,为朱明王朝佛教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。迄今为止,学术界关于朱元璋佛教政策的研究成果颇丰。现有论文重点着笔于朱元璋对佛教的整顿和限制,而关于其对佛教的怀柔、礼遇政策重视不够;影响朱元璋佛教政策制定的前提,即其对佛教的基本观点及态度,学者们研究的也很少。

### 一、朱元璋对待佛教的基本观点

朱元璋对佛教有关理论作了新的阐释,形成了独特的佛教观点。全面深入地研究朱元璋的佛教思想,对深化明代佛教政策、明代社会以及朱元璋本人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。

---

**作者简介:**黄世福(1967—),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副教授,哲学博士,研究方向:儒佛比较。

〔\*〕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点项目“明太祖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研究”(项目批准号:2010sk070zd)的研究成果。

### (一) 儒佛主辅论

儒佛皆为圣贤之道。朱元璋认为儒之圣贤,之所以被称为圣贤,是因为其善守“三纲五常”之不易之道,又能身体力行而化导天下愚顽;佛教则神通变化,谈虚无之道,以果报因缘演教,除了在“别阴阳虚实”方面与儒不同外,“非异圣人之道”。<sup>[1]</sup>可见,从根本上说,儒佛皆为圣贤之道。

朱元璋重点强调,佛教“暗理王纲”、“阴翊王度”,有辅助教化的功能。佛教可以“化凶顽为善,默佑世邦,其功浩瀚”,<sup>[2]</sup>佛教的道德教化功能可使人向善,有利于帝王治理天下。

三教一致,以儒为主。朱元璋认为,佛教虽可“阴翊王度”、“暗理王纲”,但是帝王若过分崇尚易使“世人皆虚无,非时王之治”;<sup>[3]</sup>但若绝弃佛道,“则世无鬼神,人无畏天,王纲力用焉”。<sup>[4]</sup>他曾严厉批评历史上统治者用行政手段消灭佛教的做法,说:“有等愚昧,罔知所以,将谓佛仙有所误国扇民,特敕令以灭之,是以兴灭无常,此盖二教遇小聪明而大愚者,故如是。”<sup>[5]</sup>佛、道教有辅助教化的作用,应看到儒佛道三教在济世利物方面的一致性,三者不可或缺,“于斯三教,除仲尼之道祖尧舜,率三王,删诗制典,万世永赖。其佛仙之幽灵,暗助王纲,益世无穷,惟常是吉。尝闻:天下无二道,圣人无两心。三教之立,虽持身荣俭之不同,其所济给之理一。然于斯世之愚人,于斯三教,有不可缺者。”<sup>[6]</sup>值得注意的是,朱元璋虽然反复论说三教一致,但在他的观念中三教的地位并非平等,而是主张三教之中,以儒为主,“三教,惟儒者凡有国家不可无。”<sup>[7]</sup>认为孔孟儒学“凡有国家不可无”,是“万世永赖”之道,而佛道只是“暗助王纲”,起辅助作用。

作为一代帝王,基于世俗统治的需要,朱元璋推崇孔门儒学。虽然曾经出家为僧,对佛教有特殊感情,但是,他不是一个人虔诚的佛教信徒。在他那里,佛教思想始终逃脱不了政治的藩篱,佛教思想从属于他的政治思想,佛教思想及政策皆以国家政治为着眼点,为封建统治服务。

### (二) 佛教虚实论

在佛法上,空与有并称,权与实相对。这是理论上正反相对的二门,是对于任何事物的两面看法。佛教为破遣凡夫的执相而立此法,执空执有、执权执实,皆非中道,故须空有、权实两遣,方得真谛。

朱元璋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。他说:“如来之教,指实言虚,因空谈有。”<sup>[8]</sup>将空与有并称、权与实相对发展成空与有并称、虚与实相对。在朱元璋看来,空、虚是同一层次的范畴,他说:“空者言虚,实者云妙”,<sup>[9]</sup>空即是虚,虚即为空。所以他通常将“空”与“虚”并用,如“空虚而不实”,<sup>[10]</sup>“入空虚之境”<sup>[11]</sup>等。

指斥“空”。佛教主张一切法都有“性”和“相”两方面,性方面的空无叫做“性空”,相方面的空无叫做“相空”。朱元璋认为“空”乃“相空”,他说:“《心经》者,每言空不言实,所言之空,乃相空耳。”<sup>[12]</sup>朱元璋还将相空分成六个方面,“所以相空有六,谓:口空说相,眼空色相,耳空听相,鼻空嗅相,舌空味相,身空乐

相。”<sup>[13]</sup>且相空非“真相之空”：“其六空之相，又非真相之空，乃妄想之相，为之空相。”<sup>[14]</sup>此处“真相之空”即性空，相空与性空相对，相空是妄想之空，是空相。执着于空相，危害极大，“愚及世人，祸及古今，往往愈堕弥深，不知其几。”<sup>[15]</sup>执着于空相，帝王会丧天下，富人会丧富，穷人会丧命，出家人会丧失成佛的可能性。唯一的出路就是去除空相之虚，立本性之实。

佛教“实而不虚”。朱元璋以佛教为“阴”、为“虚”：“所以佛之道云阴者何？举以鬼神，云以宿世，以及将来，其应莫知，所以幽远不测，所以阴之谓也，虚之谓也”；<sup>[16]</sup>以孔孟儒学为“阳”、为“实”：“其圣贤之道为阳教，以目前之事，亦及将来，其应甚速，稽之有不旋踵而验，所以阳之谓也，实之谓也。”<sup>[17]</sup>朱元璋认为，虽然儒、佛在名称和行为上有众多相异之处，但二者济世利物的最终目的是相通的，“斯二说，名之则也异，行之则也异，若守之于始，行之以终，则利济万物，理亦然也。所以天下无二道，圣人无两心。”<sup>[18]</sup>佛教虽然“指实言虚，因空谈有”，但“化及万类，善被诸方”<sup>[19]</sup>的功效不可否认。针对时人对佛教“虚而不实”的指责，朱元璋批评道：“今时之人，罔知佛之所以，每云法空虚而不实，何以导君子、训小人！”<sup>[20]</sup>这里“今时之人”的观点主要受程朱理学的影响，其中以朱熹的观点最有代表性。朱熹虽然暗自吸取了佛教的众多观点，但他表面上却激烈反佛。朱熹反佛，主要集中在批评佛教废弃“三纲五常”，他说：“佛老之学，不待深辨而明，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，已是极大罪名，其它更不消说。”<sup>[21]</sup>“三纲五常”是朱熹学说中“理”的主要内容，朱熹称自己的“理”为“实理”，而把佛教中所讲的“理”称作“虚理”。朱元璋不同意这一偏激的说法。按照朱元璋的观点，佛教从根本上说是“实而不虚”，“佛之教实而不虚，正欲去愚迷之虚，立本性之实”。<sup>[22]</sup>佛教的存在正是为了“去愚迷之虚，立本性之实”，此处所立之本性，正是儒家之“三纲五常”，所以，朱元璋说，佛教“演说者，乃三纲五常之性理也。”<sup>[23]</sup>这里，他把儒佛两家思想说成是二而一、一而二的关系，二者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是完全一致的。这是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正统思想的重要修正。

### （三）天堂地狱解

天堂，天上宫殿；地狱，六道中最苦的地方，因其位置在地下，故名地狱。佛教认为，善人死后当升天堂，享受各种福乐；恶人则入地狱，遭受各种苦痛。天堂地狱是人死后的归宿，佛教信徒把死后进天堂作为重要奋斗目标。

天堂地狱既然为死后之事，人们不禁要问：天堂地狱真的存在吗？善人真的会升天堂，恶人真的会下地狱吗？这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，谁也不能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。对天堂地狱怀疑导致的后果是，天堂对善人的诱惑力以及地狱对恶人的威慑力都会下降。

朱元璋对传统天堂地狱说进行发展。他否定佛道二教对天堂地狱的理解，说：“僧言地狱镬汤，道言‘洞里乾坤’、‘壶中日月’，皆非实象。此二说俱空，岂足信乎！”<sup>[24]</sup>认为佛教所言地狱镬汤之惩处并非实象，不足信。他对传统的天堂地狱观进行发展，将死后的天堂地狱搬到今生今世，朱元璋把遵守封建法度纲常

的富贵生活说成是“天堂”，而把违背封建王法的“顽恶不悛”之民及贪官污吏所受到的惩罚说成是“地狱”。<sup>[25]</sup>这种把天堂地狱从虚无缥缈的来世转移到世俗人间，一反佛教否定今世，把人世看成一片苦海的说法，确实别具一格。此种解释之目的实为借用佛教理论进行世俗教化，巩固世俗封建统治。

#### (四)“力修力行”说

关于佛教修行，朱元璋认为，佛教在修行过程中必须静心，“务靖不喧”，时时消除私心杂念，清心寡欲，如此下去，必将获得“果报”。“修行”，就是磨砺；“行”，就得身体力行；“功”，就是造化的积累。<sup>[26]</sup>“修行”必须经过一番苦修，才能有所收获。严寒酷暑不言苦，穷居独处忘忧乐，在此过程中切忌急于求成，应“不期然而然”。

而现世修行者，一方面不耐求佛漫长，“期验欲疾”。“今之修者，期验欲疾，茫然久之，心不耐己，虑不隔尘世之有者，念无不在。”其结果是“失道迷宗，愆重嵬山”；<sup>[27]</sup>另一方面，“不务佛之本行”，反其道而行之。<sup>[28]</sup>显然，传统的修行方式与世俗统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，正确的修行方式是“入博修之道”。<sup>[29]</sup>“入博修之道”，首先是坚持佛教之苦修，做“力修”之僧，积极出世；更为重要的是要“力行”，积极入世，“食俸禄”、“辅君政”。亦出世亦入世，亦僧人亦官吏，其根本目的是倡导佛家人世，使神权与政权集合为一体，以便更好地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。

总之，朱元璋对佛教的认识相当深刻，在某些方面有理论建树，但总体看来，他却未能形成系统的佛学思想。然而透过其佛教理论观点，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心路历程：力图使佛教儒学化，从出世走向入世，使宗教服从、服务于封建统治。朱元璋对待佛教的态度和观点，为朱明王朝佛教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
## 二、朱元璋的佛教政策

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里，颁布过许多有关佛教的政策，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：一方面是整顿和限制的政策；另一方面是怀柔、礼遇的政策。下文对两方面作具体分析。

### (一)朱元璋的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

元代帝室崇信佛教，僧团问题百出，如寺院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，还大肆涉足工商业，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，更为严重的是僧人生活堕落。早年出家经历，使朱元璋对元末佛教道风不正、纲纪不存、戒律松弛等教界弊端有深刻体认。有鉴于此，朱元璋即位之后在尊崇佛教的同时，力整僧团。

#### 1. 建立教僧

教僧制度是朱元璋佛教政策中一项重要举措。为何要设立教僧？一是世俗的宗教需求。如前所述，朱元璋鼓励僧侣山林“力修”，但民众又有宗教需求。建立教僧制度，可完全由教僧来赴应世俗佛事。二是元末民间有假借佛教名义，模仿法事，危害社会。

针对明初佛教现状和民间显密法事盛行的现实,朱元璋将天下僧人分为禅、讲、教三类。禅者,指禅宗,主张不立文字,见性成佛;讲者,注重宣讲佛教义理,是禅宗以外的派别;教者,演佛利济众生之法,专门从事祈福消灾、超度亡灵,即专门为应对世俗佛事需要而设置。

在三类僧人中,朱元璋更为重视教僧。他在洪武七年的《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》中说:“朕观释道之教,各有二徒,……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,独为自己而已。教与正一专以超脱,特为孝子慈亲之设,益人伦,厚风俗,其功大矣哉!”<sup>[30]</sup>意即教优于禅。因此,他对教僧更为重视,对教僧法事仪式、真言密咒、业务标准以及技能考核等都有严格规定。<sup>[31]</sup>对教僧重视的同时,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洪武二十四年颁布“申明佛教榜册”,所列条目中,绝大部分是针对教僧作出规定和限制,并禁止世俗仿教僧行瑜伽法事以及禁止禅、讲二宗僧侣赴应世俗佛事。

朱元璋如此重视教僧制度,其目的可归纳为:用佛教进行战后安抚;端正宗教行为,以纯正佛教;防止教僧与世俗相混淆等等。在朱元璋之三分僧侣制度中,唯有执行经忏礼仪之教僧与民众直接接触,而禅僧与讲僧则被要求离群索居、远离大众。因此对教僧的规范和限制,归根结底在于彻底掌控佛教,更好地发挥其“阴翊王度”、教化民众之功能,为朱明王朝千秋万世服务。

## 2. 完善僧官

僧官制度,即由世俗政权任命僧侣为各级僧官,以管理僧尼事务、统御佛教的制度。僧官,即受命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僧人,又称僧纲。主要任务为:掌管僧籍,以僧律统辖僧尼,并充当朝廷与教团间的协调者,在官方有关机构统领之下,处理有关佛教事务。

僧官的设置,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,此后各朝沿袭。但朱元璋创设的僧官制度,其体系完备、品阶森严、政治色彩浓厚,为以往历朝所罕见。

从善世院到僧录司。明代初年,朱元璋于金陵天界寺设置善世院统领全国教团,置有统领、副统领、赞教、纪化等职。由于善世院的官职设置及管理体制不够健全,洪武十五年将善世院并入新成立之僧录司。僧录司,统率天下僧纲司(府)、僧正司(州)、僧会司(县),负责僧籍名册之制作、寺庙登记、僧官俸禄定制、僧官出入伞盖配备、住持缺额之考录、度牒之出给、僧尼之戒行统制及违犯清规之处置等佛教事务。每一项事务均有严格规范的程序。

可见,朱元璋时期的僧官制度非常严密,且系统化,从中央到各府、州、县,建立了与行政体制相适应的四级僧官体系,这在以往各朝是没有的。各级僧官有明确的品阶、俸禄规定,僧官的铨选任免成制,考录有常,伞盖有别,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时代特点。特别是僧官被赐品阶、食俸禄制度,表明僧官已官吏化,这是明初佛教政策的一大创新。朱元璋设立僧官,以僧治僧,一方面与其中央集权统治有关,佛教明显成了中央集权组织;另一方面,通过僧官的监督和管理,达到僧俗隔离的目的。

另外,朱元璋还把内地的僧官制度推行到西藏、青海等边疆地区。明初,为了加强对西藏等地区的统治,朱元璋对“委身”“效顺”之僧俗首领,均予颁赏授职,授予他们“帝师”、“国师”、“大国师”、“灌顶国师”等封号,争取他们效劳朝廷,从而达到化导边陲,治理藏区的政治目的。

### 3. 规范僧行

明初,佛教存在诸多问题,较为突出的是僧人生活堕落,违反戒律,“不务佛之本行,污世俗、居市廛”,<sup>[32]</sup>“财宝既集,淫欲并生”,<sup>[33]</sup>“欢妻抚子,暗地思欲”,<sup>[34]</sup>“多与俗混淆,尤不如俗者甚多,是等其教而败其行。”<sup>[35]</sup>甚至出现“各处僧寺多隐逃军、逃囚”,<sup>[36]</sup>僧寺成为作奸犯科者藏匿之所。因此,洪武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范僧侣行为。

#### (1) 检束僧行

洪武前期,宗教政策相对宽松,表现在佛教方面,尚未建立僧伽管理机构,也未出台系统的佛教政策,因而对僧人的限制相对较少。

洪武十四年后,一系列佛教管理措施出台,尤其是洪武二十四年的“申明佛教榜册”和二十七年的“新榜册”,在检束僧行方面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。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:一是申明禁止僧俗混杂,并清除僧人私有妻室问题;与其相对的是,朱元璋提倡僧人远离尘嚣,清修苦行。二是下令教僧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;与之相对则是禁止世俗效仿瑜伽教僧作佛事,违者从严治罪。如此繁琐的规定是否会限制佛教的发展?朱元璋指出:“僧若依朕条例,……行之岁久,佛道大昌。”<sup>[37]</sup>他认为,若依照此政策措施,佛教的传播不但不会受到限制,反而会昌盛。此政策措施显然是僧俗隔离政策。

#### (2) 加强度牒及僧籍管理

为防伪滥,朱元璋严格度牒制度。首先,确立三年一次出给度牒制度,且严加考试。取消了唐代以来的鬻牒制,采取试经给度牒,以此限制僧众数量,提高其质量。其次,限制出家年龄。规定“民年二十以上者,不许落发为僧。”<sup>[38]</sup>以此防止劳动力流失。同时,为了防止人口减少,朱元璋还限制育龄妇女出家。

造僧籍册。为了整治并防止逃丁避罪者易名为僧,导致伪僧泛滥。朱元璋特命造僧人“周知册”。“周知册”包括僧名、籍贯、年甲、姓名、出家寺庙、披剃簪戴年月、所授度牒字号,等等。编集成册后,刊布全国寺院,互相周知,以备查验,故名“周知册”或“周知板册”。云游僧人到任何一地,首先即被问来自何地、何寺及僧名年龄,然后揭册验实,方许挂搭。若册内无名,或年龄、相貌不符,即被“擒拿解官”,《周知板册》的编造,是明初空前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体现。其内容之详尽,规定之细密,管制之严格,惩罚之严厉,为历代所未有。

朱元璋通过年龄、性别、考试、造册等措施加强度牒及僧籍管理,无非是防止伪僧泛滥,影响国家差役及社会安全;同时,藉此控制僧人数量,提高僧人素质。

朱元璋一系列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,最根本之处在于使僧俗两界划清界限。

其如此注重僧俗两界之隔离,一是为了整顿僧纪,革除教界弊端,以便僧人潜心修行。在朱元璋看来,唯有僧界风清气正,才能率先垂范,匡正世风。二是为了避免野心家利用宗教蛊惑民众起来造反。朱元璋早年利用明教起兵,并获得成功,他再也不愿意看到别人也来要这一套。正如吴晗在《朱元璋传》中说:“元朝末年二十年的混战,宣传标榜的是‘明王出世’,是‘弥勒降生’的预言。朱元璋是深深明白这类预言、这类秘密组织的意义的。他自己从这套得到机会和成功,成为新兴的统治者,要把这份产业永远保持下去,传之于子孙,再也不愿意、不许别的人也来要这一套,危害政权。”<sup>[39]</sup>而僧俗混杂,相互鼓荡,很容易给对当局不满的野心家以可乘之机,故必须严加管制。特别对于僧人与官府随便结交,朱元璋认为危险性很大,必须严加取缔,洪武二十七年的“新榜册”第四条规定:“凡住持并一切散僧,敢有交接官府,悦俗为朋者,治以重罪。”<sup>[40]</sup>

## (二) 朱元璋的佛教怀柔、礼遇政策

朱元璋虽然对佛教进行了整顿和限制,但其目的并非要压制佛教的发展,而是为了让其更好地为大明王朝的统治服务。因此,在整顿和限制的同时,朱元璋还对佛教采取了怀柔和礼遇政策。

### 1. 选僧入仕

朱元璋注意到僧人中有能治世之贤才,力劝他们还俗从政为官。在朱元璋的思想深处,孔门儒学乃治世之学,实而不虚;佛教虽谈空论虚,但虚中有实,佛教之“实”即儒家之伦理纲常。儒佛有相通之处,因此僧人可入世从政。朱元璋曾说,僧人是“贤人君子,托身隐居”,其“文华灿烂”、“贴体孔门之学”,应“求名儒以改益之”,为我所用。<sup>[41]</sup>

本着这一思想,朱元璋选择一批僧人还俗为官。如钟山僧吴印有才智,朱元璋“亲擢为山东布政使”。<sup>[42]</sup>其中也有不从者,例如天界寺住持僧宗泐,命其蓄发为官,宗泐“辞而求免,愿终世于释门”,朱元璋因其不慕富贵,淡泊名利,而为之作《赐宗泐免官说》。朱元璋从僧人中选拔官僚,与洪武时期科举尚乏人才,注重从草野中选拔人才的做法是一致的,从中可以看出朱元璋以入仕从政为正途的政治立场。

### 2. 遣僧出使

明初,朱元璋利用佛教对外交往,派遣僧侣出使外邦,实行和平外交,取得了巨大成功。朱元璋遣僧出使的地点有西域的吐蕃、西天尼八剌国、日本等。

洪武三年六月,“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,仍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。”<sup>[43]</sup>洪武十一年,遣僧宗泐等使西域。朱元璋遣僧出使政策效果明显,使得西域一代边境为官者“遵朝廷之法,抚安一方”,为僧者“敦化导之诚,率民为善,以共乐太平”,<sup>[44]</sup>来朝称臣、纳贡请封者交错于途。这一政策直至永乐年间仍然遵行,从而使明代赢得了西陲安定,以致“终明世无番寇之患”。<sup>[45]</sup>

对日本,洪武四年十月,遣僧祖闾、克勤往使。元末征伐日本失败后,中日关系紧张,导致日寇在明初屡次侵扰中国沿海地区。朱元璋登基后即派使节赴日

责问,使者“谕以‘中国威德而诏旨有责让其不臣中国’语”。<sup>[46]</sup>迫于明初国力强大的压力,日本国王主动向明朝称臣示好,“癸巳,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,贡马及方物,并僧九人来朝,又送至明州、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。”<sup>[47]</sup>当得知日本良怀亲王信佛,朱元璋随即在日本僧祖来辞别之际,派遣僧人祖阐、克勤等共8人出使日本,利用佛教调解与日本的关系。“遣僧祖阐、克勤等八人护送还国,仍赐良怀《大统历》及文绮纱罗。”<sup>[48]</sup>自此,日本国王多次派僧人来“表贡方物谢罪”,一时间中日关系融洽。

在中国历史上,像朱元璋一样多次遣僧出使异域充当和平使者并不多见。朱元璋遣僧出使之由,一方面藉僧之力使藩属归附。吐番及西域诸国多崇奉佛教,因此,遣僧出使,因俗施治,可以控制藩国,安抚边陲。如朱元璋曾言:“念其俗佞佛,可以西方教诱之也。”<sup>[49]</sup>另一方面,体现对高僧的重视,兼具礼遇高僧之效果。

### 3. 祭祀僧人

每当僧官或寺庙住持病故,朱元璋皆令祠部备祭物,遣礼部去祭祀。这也是朱元璋礼遇佛教方式之一。洪武十八年三月十八日,“圣旨:‘僧录司右觉义如锦病故,恁礼部办素祭去祭祀他。钦此。’令祠部备祀库支价买祭物,前去祭祀。”<sup>[50]</sup>此种礼遇类似君主处理臣属病故的方式,朱元璋显然将方外的有职位僧人纳入其官僚体制。

朱元璋还通过撰文祭祀僧人,如《祭保志法师文》、《祭道林文》等。他亲自为八百多年前圆寂的保志大师撰写祭文,祭文夸赞大师前景张佛教、化导凶顽,并为大师建造佛塔于山之左。<sup>[51]</sup>

### 4. 整理经典

佛教之建寺、造像、置经等,凡与弘扬佛法有关之活动或仪式皆为佛事。朱元璋热衷于刊刻、注解佛经等佛事,是其弘扬佛法,礼遇、怀柔佛教的重要表现。洪武五年春,“即蒋山寺建广荐法会。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。”<sup>[52]</sup>正是因为此次钦“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”的记载,才有后世关于《南藏》始刊于洪武五年之说法。《南藏》为明初在应天府(今南京市)刊刻的官版大藏经,实际刻过两次。初刻于洪武年间,不过初刻完成不久就遭到火灾毁灭,因而印本流传少,直到1934年才在四川崇庆的上古寺重新被发现;再刻于永乐年间,后人常将永乐刻本认为《南藏》。吕澂先生认为,《初刻南藏》“开雕的年代很早,洪武五年(1372年)四方名僧集合于蒋山点校藏经,就已做刻经准备。刻事进行到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全藏大体完成。”<sup>[53]</sup>

此外,朱元璋注重对佛教经典进行统一注解。洪武十年,“诏天下沙门讲《心经》、《金刚》、《楞伽》三经,命宗泐、如玘等注释颁行。”<sup>[54]</sup>此举之目的,一方面为了探究佛理,另一方面在于统一教义理解,统一思想认识,从而得到思想控制之政治目的。

朱元璋之所以对佛教采取怀柔、礼遇政策,一方面,因为其早年有出家经历,



后成为一代帝王后,很自然对佛教有特殊感情;另一方面,最为根本的是因为佛教有“阴翊王度”作用,能够为巩固朱明王朝政权服务。正如吴晗所言,朱元璋“三十多年来,儒生,道士,和尚,三教九流,都被尽量利用,巩固他的皇座。”<sup>[55]</sup>但是,作为封建帝王,三教之中,朱元璋以儒为主,佛道为辅,这就决定了朱元璋对佛教的护持和保护力度相对有限,在护持和保护的同时兼有限制。

### 三、朱元璋佛教政策的影响

朱元璋既整顿和限制又怀柔和礼遇的佛教政策,对明代经济发展、中央集权政治强化以及有明一代佛教政策的制定等,均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#### (一)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

佛教若过度发展,必然要与世俗争利。明初采取了有效措施使佛教势力得到抑制,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。朱元璋时期,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佛教管理机构,对僧人的资格、年龄、人数、选拔条件等均有严格规定。严格度牒制度、限制出家年龄等措施,有效地减少了劳动力的流失;对寺庙规模及数量的整顿,使大批寺院土地收归国有,从而确保了国家的赋税收入。到洪武二十六年,国家耕地面积比元末增长一倍多;米、麦、豆、谷等农作物年征收田赋额是元代的三倍。呈现出一派繁荣盛世景象。

#### (二)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

朱元璋时期,从中央到各府、州、县,建立了与行政体制相适应的四级僧官体系。各级僧官有明确的品阶、俸禄规定,僧官的铨选任免成制,考录有常,伞盖有别。表明僧官已官吏化,僧官机构已衙门化,体现了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时代特点,同时也表明封建皇权能有效地掌控着教权。另外,朱元璋还选僧人入仕,封赏藏传佛教高僧等,使僧人直接为封建皇权服务。这些都有助于强化有明一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。

#### (三)奠定了有明一代佛教政策的基础

朱元璋的佛教政策,对有明一代产生了重大影响,成为明朝宗教政策的基础。其后诸帝,虽然对佛教和佛教政策的态度与朱元璋有不同程度的差异,但并无本质的对立。例如,建文帝对佛道教与国家政治关系的认识与朱元璋基本一致,认为佛道教有“阴翊王化”之功效。明成祖朱棣的宗教思想与行为同朱元璋相似:比如,禁止僧俗混淆。永乐十年,鉴于天下僧人多不守戒律,以及“俗人行瑜伽法”,成祖重申洪武禁令,违者严惩。再如,保留僧录司等各级僧官,将僧人划分为禅、讲、教三类,各朝重申洪武时期一些规定度僧,采取限制身份、限制年龄、定期考试等办法严格度牒管理,限制出家为僧等。朱棣崇尚儒学,以儒家“五经”治天下,为《金刚经》作序,任用僧道人士做官。只是对佛、道教的关注甚于太祖,信奉佛、道教。孝宗比较崇尚儒学,他在位前期,积极务政,对寺院泛滥有所整顿;中期以后,不再勤政,沉迷于佛、道、方术。总之,朱元璋的佛教政策为有明一代佛教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甚至到了清代,僧官制仍依明制而设,然

而已无统摄僧尼之实权。

#### (四) 加剧了佛教的衰微

朱元璋虽然对佛教有保护和提倡政策,但对唐宋以来佛教的衰微趋势,他是无力扭转的,并且其佛教政策反而加剧了这一趋势。他划分僧人为禅、讲、教三类,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僧人修行及其对佛学精髓的把握,导致佛教人才匮乏。他严禁僧俗混淆,提倡避世修行,又使一些僧人被迫走向山林。正如释见晔所言:“这种‘离群索世的佛教’、‘山林佛教’、‘经忏佛教’、‘死人佛教’,使得佛教远离知识,让其思想体系难以再诠释、更新,以因应时代需要。同时也让佛教远离大众,社会大众若欲接触佛教,其因缘却大多在死者葬仪、经忏仪式的场合,以致对佛教缺乏正确性的了解。”<sup>[56]</sup>正因为如此,朱元璋的佛教政策加剧了佛教的衰落。

#### 注释:

[1][16][17][18][28][29][32] 朱元璋:《明太祖集·宣释论》,胡士萇点校,合肥:黄山书社,1991年,第227-228、228、228、228-229、229、228页。

[2][41] 朱元璋:《明太祖集·拔儒僧文》,胡士萇点校,合肥:黄山书社,1991年,第265、266页。

[3][4][5][6] 朱元璋:《明太祖集·三教论》,胡士萇点校,合肥:黄山书社,1991年,第215、215、215、215-216页。

[7][24][34] 朱元璋:《明太祖集·释道论》,胡士萇点校,合肥:黄山书社,1991年,第213、212、213页。

[8][19] 朱元璋:《明太祖集·习唐太宗圣教序》,胡士萇点校,合肥:黄山书社,1991年,第299、299页。

[9] 朱元璋:《明太祖集·钟山僧妙云说》,胡士萇点校,合肥:黄山书社,1991年,第340页。

[10][11][12][13][14][15][20][22][23] 朱元璋:《明太祖集·心经序》,胡士萇点校,合肥:黄山书社,1991年,第307、308、307、307、307、307-308、307、307、307页。

[21] 《朱子语类》卷126。

[25] 朱元璋:《明太祖集·拔儒僧入仕论》,胡士萇点校,合肥:黄山书社,1991年,第226页。

[26][27] 朱元璋:《明太祖集·谕天界寺僧》,胡士萇点校,合肥:黄山书社,1991年,第170、170页。

[30] 《道藏》第9册,第9页。

[31][36][37][40][50][52][54][明] 葛寅亮:《金陵梵刹志》(上),何孝荣点校,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7年,第54、64、68、67、55-56、49、50页。

[33] 朱元璋:《明太祖集·僧俗纯一敕》,胡士萇点校,合肥:黄山书社,1991年,第156页。

[35] 《释鉴稽古略续集》卷2。

[38][43][44][46][47][48] 《明实录·太祖实录》卷184、53、79、68、68、68。

[39][55] 吴晗:《朱元璋传》,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2年,第116、228页。

[42] 王圻:《续文献通考》卷254,台北:文海出版社,影印明万历刊本,第25页。

[45] 《明史》卷331《西域传》3。

[49][清] 张廷玉等:《明史·外国三》卷322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8342页。

[51] 朱元璋:《明太祖集·祭保志法师文》,胡士萇点校,合肥:黄山书社,1991年,第420页。

[53] 吕澂: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》卷三,济南:齐鲁书社,1996年,第1475页。

[56] 释见晔:《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讨》,《东方宗教研究》1994年新4期。

[责任编辑:嘉 耀]